

## 源流探析

## 《三国志》与《三国演义》关系三论

史书《三国志》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关系，历来为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者所重视。叙述《三国演义》成书过程的论著，虽每每都会涉及这一关系，但大多浅尝辄止，语焉不详，其间不乏含糊之论。本文在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，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，主要提出三点见解。

### 一、《三国志》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史料来源

对《三国演义》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，主要有《三国志》（包括裴松之注）、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鉴纲目》。其中，《通鉴纲目》的材料基本上来自《资治通鉴》，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，并对《三国演义》产生影响，因此这里暂且不列入比较范围。那么，在其余三书中，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《三国演义》的作用最大呢？要回答这一问题，必须对《三国演义》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既然是考察《三国演义》情节的史料来源，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。试看以下诸例。

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：在这些史书中，《三国志》（包括裴注）乃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史料来源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提供史料而言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本文往往不及裴松之的注。这是因为，裴松之作注，不同于一般的侧重训诂、名物、典章的典籍注释，而是“务在周悉，上搜旧闻，傍摭遗逸”<sup>①</sup>，尽可能地“求全”，以发挥补阙、备异等多种作用。因此，

---

①（刘宋）裴松之：《上 三国志注 表》。

3

他采用的史料中，有相当部分是陈寿没有看到的（包括在陈寿身后出现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（含裴注）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1回：装病诬叔	《魏书·武帝纪》裴注引《曹瞒传》记载此事。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（含裴注，下同）。
第2回：怒鞭督邮	《蜀书·先主传》记载，裴注引《典略》所记更详。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而移花接木，将鞭督邮者由刘备改为张飞。
第4回：董卓废少帝，立献帝	所宣废立策文，见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裴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。	《后汉书》之《灵帝纪》《献帝纪》均不载此策，《董卓传》叙及此策，仅引一句。	据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第4回：捉放曹	《魏书·武帝纪》及裴注引王沈《魏书》《世语》。	未涉此事。	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及裴注引《郭颂世语》，未及杀吕伯奢家人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第6回：孙坚得玉玺	《吴书·孙破虏传》裴注引韦昭《吴书》：“（孙）坚入洛，扫除汉宗庙，祠以太牢。坚军城南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，莫有敢汲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汉传国玺，文曰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，方圆四寸，上纽交五龙，上一角缺。初，黄门张让等作乱，劫天子出奔，左右分散，玺者以投井中。”	《后汉书·袁术传》注引韦昭《吴书》：“汉室大乱，天子北诣河上，六玺不自随，掌玺者以投井中。孙坚北讨董卓，顿军城南，甄官署有井，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，使人浚井，得汉传国玉玺，其文曰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。”	卷六十，初平二年：“（孙）坚进至洛阳……乃扫除宗庙，祠以太牢，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。”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9-10回： 犯长安	第10回写李傕、郭汜等索要要官爵，与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几乎全同。其中张济为“骠骑将军、平阳侯”，《三国志》误，《演义》随之而误。	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：“傕又迁车骑将军，假节。府，领司隶校尉，假将军，汜后将军，稠右将军，并封张济为镇东将军，并封列侯。”《献帝纪》大致同。	《通鉴》叙述据《后汉书》，但张济官职写成“骠骑将军”。然而同册兴平二年又云：“六月‘庚午，镇东将军张济自陝至’。七月‘丙寅，以张济为骠骑将军，开府如三公’。前后自相矛盾。前记误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第13回：李 傕、郭汜大交兵	《演义》写李傕侄李暹“用车二乘，一乘载天子，一乘载伏皇后，使贾诩、左灵监押车驾”。系据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裴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：“傕使兄子暹……以车三乘迎天子。……于是天子一乘，贵人伏氏一乘，贾诩、左灵一乘，其余皆步从。”	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：“傕……即使兄子暹……以车三乘迎天子、皇后。”未及贾诩、左灵。	据《后汉书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。
第17回：借 头欺众	《魏书·武帝纪》裴注引《曹瞒传》：“常(尝)讨贼，麋谷不足，私谓主者曰：‘如何？’主者曰：‘可以小斛以足之。’太祖曰：‘善。’后军中言太祖欺众，太祖谓主者曰：‘特当借君死以厌众，不然事不解。’乃斩之，取首题徇曰：‘行小斛，盗官谷，斩之军门。’”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依据《三国志》而有所增饰。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 17 回：割发代首	《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曹瞒传》：“帝(崇)出军，行经麦中，令士卒无败麦，犯者死。骑士皆下马，付麦以相持。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，敕主簿议罪；主簿对以《春秋》之义，罚不加于尊。太祖曰：‘制法而自犯之，何以帅下？然孤为军帅，不可自杀，请自刑。’因援剑割发以置地。”	未涉此事。	未及此事。	据《三国志》而有增饰。
第 18 回：拔矢啖睛	《魏书·吕布传》：“建安三年，布复叛为木，遣高顺攻刘备于沛，破之。太祖遣夏侯惇救备，为顺所破。”《夏侯惇传》：“惇从征吕布，为流矢所中，伤左目。”注引《魏略》：“军中号惇为盲夏侯。”	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：“建安三年，布遂复从袁术，遣(高)顺攻刘备于沛，破之。曹操遣夏侯惇救备，为顺所破。”	建安三年：“吕布复与袁术通，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；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，为顺所败。”	据《三国志》而有增饰。
第 19 回：白门楼斩吕布	《魏书·吕布传》：“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急，乃下降。遂生缚布，布曰：‘缚虎不得急也。’布请曰：‘明公所患不过于布，今已服矣，天下不足忧。’明公将步，刘备用疑色。太祖进曰：‘明公不见布之事于建阳及董最叵信者。’于是杀布。”	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：“布与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之急，令左右取其首诣操。左右不忍，天下定矣。布曰：‘何以言之？’布曰：‘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，今天下不足定也。’顾谓刘备用玄德，卿为坐上客，我为降虏，绳缚我急，独不可一言言那？’操笑曰：‘缚虎不得急。’乃命缓布缚。刘备用曰：‘不可。’明公不见吕布事于建阳、董太师乎？’操顿之。布曰：‘大耳最叵信！’……布及官、顺皆杀之，传首许市。”	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：“布与麾下登白门楼。兵围之急，令左右取其首诣操。左右不忍，天下定矣。布曰：‘何以言之？’布曰：‘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，今天下不足定也。’顾谓刘备用玄德，卿为坐上客，我为降虏，绳缚我急，独不可一言言那？’操笑曰：‘缚虎不得急。’乃命缓布缚。刘备用曰：‘不可。’明公不见吕布事于建阳、董太师乎？’操顿之。布曰：‘大耳最叵信！’……布及官、顺皆杀之，传首许市。”	据《后汉书·吕布传》。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(含裴注)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<p>第 20 回：许田关羽欲诛曹操</p>	<p>《三国志·蜀书·关羽传》裴注引《蜀记》：“初，刘备在许，与曹公共猎。猎中，众散，羽劝备杀公，备不从。”裴松之曰：“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肯从者，将以曹公腹心亲戚，实繁有徒，事不宿构，非造次所行；曹虽可杀，身必不免，故以计而止。”</p>	<p>未涉此事。</p>	<p>未及此事。</p>	<p>依据《三国志》而有增饰。</p>
<p>第 23 回：裸衣骂曹</p>	<p>未及此事。</p>	<p>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：“(孔)融既爱衡才，数称述于曹操。操欲见之，而衡素相轻疾，自称狂病，不肯往，而数有恣言。操怀忿，而以其才名，不欲杀之。闻衡善击鼓，乃召为鼓史，因大会宾客，阅试音节。……衡……裸身而立，徐取琴、单绞而著之，毕，复叁挝而去，颜色不怍。……衡乃著布单衣、疏巾，手持三尺棰杖，坐大营门，以杖捶地大骂。……操怒，谓融曰：‘祢衡竖子，孤杀之犹雀鼠耳。顾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将谓不能容之，今送与刘表，视当何如。’于是遣人骑送之。”</p>	<p>未及此事。</p>	<p>依据《后汉书》而有增饰。</p>

续表

《三国演义》情节	《三国志》（含裴注）	《后汉书》	《资治通鉴》	结论
第 29 回：孙策之死	<p>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讨逆传》：“先是，策杀（许）贡，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。策单骑出，卒与客遇，客击伤策。创甚……至夜卒。”裴注引《江表传》：“策性好猎，将步骑数出。策驱驰逐鹿，所乘马精骏，从骑绝不能及。初，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：‘孙策骁雄，与项籍相似，宜加贵宠，召还京邑。若被诏不得不还，若放于外，必作世患。’策候吏得贡表，以示策……策即令武士绞杀之。贡奴客潜民间，欲为贡报仇。猎日，卒有三人即贡客也。策问：‘尔等何人？’答云：‘是韩当兵，在此射鹿耳。’策曰：‘当兵吾皆识之，未尝见汝等。’因射一人，应弦而倒。余二人怖急，便举弓射策，中颊。后骑寻至，皆刺杀之。”</p>	<p>未涉此事。</p>	<p>卷六十三，建安五年：“初，策杀吴郡太守许贡，贡奴客潜民间，欲为贡报仇。策性好猎，数出驱驰，所乘马精骏，从骑绝不能及，卒遇贡客三人，射策中颊，后骑寻至，皆刺杀之。策创甚……丙午，策卒。”（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讨逆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）</p>	<p>据《三国志》。</p>
第 34 回：马跃檀溪	<p>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注引郭颁《世语》。</p>	<p>未涉此事。</p>	<p>未及此事。</p>	<p>据《三国志》。</p>



的),也有相当部分是陈寿虽然看到却不采用的。这些史料,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、生动性和多样性,其中包含不少的小说因素。例如,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,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正文不着一字,裴注却连引王沉《魏书》、郭颁《世语》、孙盛《杂记》的三条材料,从不同角度记叙此事,生动地表现了曹操的性格和事发时的心态。罗贯中着重采用后面两条材料,进行艺术描写,并做了两点强化:一是将史料中并不在家而没有被杀的吕伯奢,写成为款待曹操而出门沽酒,归途中也被曹操杀害;二是将史料中曹操杀人后“凄怆曰:‘宁我负人,毋人负我!’”强化为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!”大大凸显了曹操知而故杀的不义色彩和强词夺理的蛮横行径,从而有力地揭示了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。类似情况,还有很多。因此,我们肯定《三国志》“是《三国演义》最重要的史料来源”时,不应将其都归功于陈寿;在很多时候,裴松之注起了更多的作用。

## 二、《三国志》并未为《三国演义》提供叙事结构框架

尽管《三国志》(包括裴注)为《三国演义》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,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,它以人物传记为主,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,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,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载于多篇纪传中,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,有时甚至互相抵牾。因此,它也不可能为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。承担这一任务的,主要是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

试以《三国演义》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“赤壁大战”为例。《三国志》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,有关材料分散于《魏书·武帝纪》,《蜀书》之《先主传》《诸葛亮传》,《吴书》之《吴主传》《周瑜传》《鲁肃传》《黄盖传》等不同人物的《纪》《传》中,不仅头绪不够清晰,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。先看《魏书·武帝纪》:

(建安十三年)秋七月,公南征刘表。……十二月……公自江陵征(刘)备,至巴丘……公至赤壁,与备战,不利。于是大疫,吏士多死者,乃引军还。

据此记载,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刘备;虽然初战“不利”,但主要还是因为遇到大疫,“吏士多死者”,才主动地“引军还”,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。裴注引《山阳公载记》云:

公船舰为(刘)备所烧,引军从华容道步归,遇泥泞,道不通,天又大风,悉使羸兵负草填之,骑乃得过。羸兵为人马所蹈藉,陷泥中,死者甚众。

这里写明了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,描写了曹军败退途中的狼狈状况;而发动火攻的,则是刘备方面,根本看不到东吴方面的作用。

然而,《蜀书·先主传》所记,与之有明显差异:

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,权遣周瑜、程普等水军数万,与先主并力,与曹公战于赤壁,大破之,焚其舟船。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,追到南郡。时又疾疫,北军多死,曹公引归。

这里写明了是孙刘联军共同大破曹军,焚其舟船,曹军遇疾疫只不过是其败退的次要原因;但是,孙刘两家,谁主谁次,却不清楚。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,然后交代结果:“(孙)权大悦,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鲁肃等水军三万,随亮诣先主,并力拒曹公。曹公败于赤壁,引军归邲。”其中完全没有提到火攻,也没说孙刘两家,谁主谁次,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不清楚。

再看《吴书·周瑜传》,所记则又有区别:

(孙)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(刘)备并力逆曹公,遇于赤壁。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,初一交战,公军败退,引次江北。瑜等在南岸。瑜部将黄盖曰:“今寇众我寡,难与持久。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,可烧而走也。”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,实以薪草,膏油灌其中,裹以帷幕,上建牙旗,先书报曹公,欺以欲降。又预备走舸,各系大船后,因引次俱前。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,指言盖降。盖放诸船,同时发火。时风盛猛,悉延烧岸上营落。顷之,烟炎张天,人马烧溺死者甚众,军遂败退,还保南郡。备与瑜等复共追。